

舞阳县历史沿革

朱 帆 宋运兴 孙好章

舞阳县地处豫中，南部有伏牛山余脉，恰在第二、三台阶地貌相接处，大部为平原，自然条件优越，历史悠久。

经考古工作者发掘、考证，北舞渡乡贾湖遗址，为裴李岗文化，距今已七至八千年历史。另有湖南部阿岗寺、寺圪塔等二十余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都保留着极丰富的原始社会晚期的文物，其中湾刘后寺圪塔遗址属龙山晚期文化，已与铜器时代接近。证明在新石器时代，这里已经普遍聚居着氏族公社的人们。

据《史记》记载：“颍川、南阳夏禹之国”。从舞阳所发现的二里头类型陶器，商代青铜器，大量周代文物，均可找出物证。《史记新探》及《左传·路史·国名记》载，东不羹国（是西周分封的嬴姓子国，后为楚所灭），与陈、蔡、西不羹国“赋皆千乘”的四大军事名城。东周时代的西胡国（今胡城集）及柏国（今舞钢区滚河南，在舞阳辖区内。战国时为合柏定陵地为韩国合伯剑产地。）

秦代分舞阳、定陵二邑，均属颍川郡（禹县）。西汉属颍川郡为侯国。汉高祖封樊哙为舞阳侯（现城西北隅有樊侯城故居遗址。）另封淳于长为定陵侯。东汉封吴汉为舞阳侯。三国时属魏，置舞阳郡，合定陵为一。魏明帝（曹丕子）

初封司马懿为舞阳宣文侯，后又分为定陵、舞阳二县。晋代属襄城郡，初仍置舞阳、定陵二县，后合为一，改名北舞阳县，县址移北舞镇。南北朝时，初属南朝宋（刘裕）。元魏太安年间（420年）置西舞阳。皇兴二年（467年）置北舞阳。永安二年（529年）置定陵郡，属广州（鲁山）。又分属东魏、北齐。隋开皇初（581年）废定陵郡，置北舞阳，属颍川郡。唐初仍为北舞县，属道州（郾城西南五里沙澧河之间）。贞观元年（627年）道州废，改属许州。开元四年（716年）废北舞县，复置舞阳县。代宗大历四年（763年）属仙州（叶县）。元和九年（814年）吴元济焚舞阳城，元和十三年（818年）移置吴城镇（今县城东三十五里处）属汝州。五代后唐时属许州。北宋时仍名舞阳县，属京畿道，颍昌府，许州忠武军。金初属京南路，泰和八年（1208年）改属裕州（方城），县置自吴城迁回今城。

元初废县，设北舞镇巡检司，归入叶县。大德七年（1303年），罢司复县。属南阳府裕州。明代（1368—1644）仍属南阳府裕州。

清初沿明制。雍正年间（1723年—1736年）直属南阳府，为宛属十三处之一。

民国初，属豫南道，1925年属汝阳道，1933年改属河南省第六行政督察专员公署。1944年4月，日军侵入舞阳，组织日伪舞阳县维持会于城内。1945年6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南部山区成立西、遂、舞、泌抗日民主县，县府设在鸡山北麓刘川沟，后迁于尹集，又迁至尚店，改组为舞、叶、方、泌抗日民主县，均归鄂、豫皖军区

豫中军分区的豫中专区领导。1945年8月，日军投降后，改建为舞、叶、方、泌民主县，政府仍设在尚店，属豫中分区领导。十一月国民党军夺取抗日胜利果实，恢复旧政权。县人民抗日民主政府结束。

解放战争期间，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在南部原抗日根据地成立舞阳县人民政府。混战状态中，县人民政府在武功、南部山区皮狐沟（今属舞钢区）、关庄、卸甲店等地游动。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十七日县城解放，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二日，县人民政府随豫西二地委、二专署从卸甲店迁回县城。1948年3月至同年12月，北部泥河以北地区属沙北县所辖，归豫西第五专员公署领导。县府在北舞渡河北街、裴城一带。1949年元月，舞阳与沙北县原舞阳辖境合并为今舞阳县，归许昌专员公署领导。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舞阳下属区、镇、乡政权，区划屡经更易，最后固定为城关镇和城关、保和、孟寨、马村、章化、北舞渡、太尉、姜店、吴城、辛安、九街、拐子王、侯集、尚店、杨庄、八台、武功、尹集、枣林等二十个公社。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六日，南部的尚店、杨庄、八台、武功、尹集、枣林等六个公社划入舞阳工区，归省直接领导。后属平顶山市，置舞钢区。

一九八四年元月，机构改革中，将上属公社改为乡（镇）政府。

山西洪洞移民河南时间初考

宋 运 兴

“问我祖先来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是河南及中原地区流传已久的民谚。但是何时、何因从山西移民中原，众说纷纭，矛盾百出，在人们思想上已成了久悬未决的谜。

一九八一年地名普查中，因洪洞移民问题涉及舞阳半数以上村名的含义、来历和建村时间，促使我们一直在研究这个问题。查阅明清史志未找到依据。一九八三年以来，为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名词典》、《河南省古今地名词典》写好我县各类地名词条，编好《舞阳县地名志》，仍带着这个问题，深入各村做调查。结果，从散乱在井边、桥上、墓地公房门槛下和一些文化老人家里，查到了有关洪洞移民的碑刻，并从不少家族谱里找到极为珍贵的地名资料，不仅澄清了有关村庄的村名含义、来历和建村时间，也给山西移民中原的时间，找到了文字根据。

今将部分碑刻、家谱有关山西洪洞移民中原的词语摘录于下，供研究者参考。太尉乡守义张现存《张氏宗派序》碑载：“原籍山西洪洞县张氏，洪武年间迁居于此，……”北舞渡乡左沟村北，现存《左氏始祖莹碑》：“原籍山右（山西的别称）人，明初迁舞，居于是村……”舞钢区王楼村现存《王氏始祖墓志碑》载：“始祖原籍山右洪洞大槐树，自明初迁舞，有诏；”马村乡庞店《庞氏祖坟碑》刻：“庞公天

章，粤稽其始，原籍山西，洪武迁民，移民于叶，”吴城乡前曹《曹氏家谱》载：“我始祖自明洪武年间，在山西平阳府洪洞县大槐树庄迁徙到舞……；”太尉乡孙庄《孙氏家谱》载：“我始祖于明初，自宏（洪）洞迁舞……”城关乡英李《李氏源流》碑文序：“……本门始于明初洪武年间，自山西省洪洞县金盆李家村迁民到此……”《太宗实录》卷十八，永乐元年（1403）年三月己未条载：“河南省裕州，言本州地广民稀，山西泽、潞等州县地狭民稠，乞于彼无田之家，分丁来耕。上命户部如言行之。”清雍正十三年（1735）年《泽州府志》卷四十九《纪事》载：“永乐元年（1403）年诏泽、潞等州无田民，分丁赴裕州垦荒。”泽为今山西晋城地区，潞为今长治地区，裕州即今方城。那时裕州辖舞阳及叶县。

根据以上这些文字资料，可以确切的证实，（一）从山西移民河南的时间是明代初期，不是明末，更不是清初；（二）明初移民对象，不只是洪洞一县的人民，还有长治，晋城等许多地区的人。（三）大槐树不是村庄，而是洪洞县城北广济寺院内的一株大树。因明政府设移民局于此，移民来办理手续时多在树下与亲友话别和休息。

明初移民中原的根本原因何在？为什么会把时间讹传明末清初？又为什么会把移民原因说成是李闯王三洗河南，杀的路上扔元宝没人拾，人被杀光，田地荒芜了，才不得移民的？这些讹误传闻，不仅混淆颠倒了史实，更重要的是欺骗愚弄了中原人民。还希望文史工作者，史志爱好者，尤其史志学专家们，用更多、更确凿的历史实际铁证，澄清历史原貌，纠正歪曲讹传，还先人事迹的本来面目，以启迪教育后人。

抗战初期的舞阳县青年救国会

中共舞阳县委党史办

“七·七事变”后，舞阳县广大青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行动起来，组织舞阳县青年救国会，为全县迅速掀起轰轰烈烈的救亡热潮，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一

一九三五年寒假，舞阳县在北平、开封、信阳等地求学的学生返回家乡。他们深受“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的影响，有着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爱国热情，有的还是“一二·九”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他们为了发动家乡同学踊跃投入抗日爱国运动，经过互相联络，在县城成立了“舞阳县留外学生假期救国宣传会”。利用各种机会，向家乡学生和广大群众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并向全国各地发了抗日救国通电。一九三六年暑假，“留外学生假期救国宣传会”的会员重返家乡，他们中有的人已加入“民先”组织。回县后又联络本县师范、中学、小学的进步师生，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举办讲演会，对全县人民进行抗日爱国教育。

芦沟桥事变后，局势混乱，学校停课。这些爱国学生面对中华民族的空前危机，回到家乡，酝酿成立一个全县性的青年救亡团体。正至此时（约九月），共产党员陈坤台（又

名陈遗)从延安回到舞阳。当地了解到这个情况后,随即与返乡学生取得联系,亲自参与组织工作。由他从中指导,经过北平大学学生臧文德、北平汇文中学学生陈麟堂、信阳师范学生胡田希等人的组织筹备,于一九三七年十月,在县城西大街城隍庙成立了“舞阳县青年救国会”(简称舞阳青救会)。并经选举产生了执行委员会,又从执委中选出九人为常务委员。青救会下设组织股、宣传股、募捐股、总务股。为开展抗日宣传,还成立了话剧团。

执委会是“青救会”的权力机构,办公地址设在国民党县党部。为了争取各方势力的支持,顺利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青救会”还建立了理事会,聘请县国民兵团长张哲超、县三青团负责人刘馨吾、二区区长屈勋亭、商务会长陈朗轩、树人中学校长宗世绅以及富商名绅孙梦山、胡卓卿、戚卓堂、苗星南、臧绍武等三十一人为理事。理事会是“青救会”名义上的最高权力组织。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曾在这里工作过的周泉森(现名邹屏)回到舞阳。次年元月,经省委批准再次建立了中共舞阳县委,周任书记。县委注重在“青救会”发展党员,并建立了“青救会”党支部。自此,“青救会”在党的直接领导下,进入了一个新的迅速发展时期。

中共舞阳县委根据当时全县救亡运动迅速发展的趋势,决定凡有党员和抗战活跃分子的地方,都要建立“青救会”的分会组织。按照县委决定,到一九三八年六月底,章化、北舞渡、马村、孟寨、胡岗、姜店、吴城、下澧河店、上澧河店、卸店、梁八台、武功、尚店、尹集、曹集、辛集、安寨、宗堂等地大都以学校师生为主,相续建立了四十三个分

会。有的分会下面还有支会。分会、支会组织建立后，广大青年踊跃加入。不久，全县会员就发展到五千余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抗日救亡高潮。

一九三八年下半年，武汉失守后，国民党反动派的抗战态度发生了变化，下令取消抗日团体，“青救会”的活动也引起了当地国民党的注意。驻舞阳县的国民党第二战地服务团向他的上级报告中称：“舞阳县‘青救会’是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分支机构遍及全县大小集镇，会员六千余人，影响之大，不可忽视”。于是，国民党舞阳县县党部特派员胡灿宇秉承国民党反动派旨意，下令解散“救国会”。中共舞阳县委根据当时的政治形势，为避免不必要的损失，保护群众的抗日热情，作出决定，减少“青救会”的活动。以后形势更趋恶化，到年底“青救会”的活动就被迫停止。

二

“青救会”团结全县广大青年，推动抗日救亡活动，这在舞阳历史上是彪炳千秋的。他们活跃在城乡各个角落，以多种形式宣传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彻底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暴行，传播中国人民抗击日本法西斯强盗的战绩，激发人们树立抗战必胜的信念，积极投入到抗日救亡的洪流中去。这些有口皆碑的事实，至今仍令人铭深不忘。

成立话剧团，演出抗日剧目和演唱救亡歌曲是“青救会”的首要工作。“青救会”的话剧团经常有二十几个人，多时达五十余人，演员中多数是共产党员和“青救会”骨干。胡田希、李景论先后任团长。剧团经常深入全县各地，利用庙会、集市、节日等机会巡回演出，教唱救亡歌曲，讲解抗日救国的道理。他们演出的剧目有：大型话剧《前夜》

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抓汉奸》、《三江好》、《兄妹开荒》、《张家店》、《抓壮丁》、《香姑娘》、《生死关头》、《劝夫从军》等。演、教的歌曲有：《大刀进行曲》、《黄河大合唱》、《义勇军进行曲》、《延安颂》、《九·一八小调》、《流亡三部曲》、《到敌人后方去》、《起来吧！祖国的孩子们》、《红缨枪》、《游击队进行曲》、《五月的鲜花》、《青年进行曲》、《抗日救亡进行曲》等。时至今日，年逾花甲的老人们当回顾到那段火热的斗争生活时，还能熟练地轻声哼唱“工农兵学商，一齐来救亡……”等歌词，听起来真是促人奋进。“青救会”的剧团还到泌阳和舞阳友军驻地进行慰问演出，给这些抗战官兵以极大的鼓舞和教育。

每个青救分会也都有自己的宣传队，除演唱外，还不断张贴标语、墙报、宣传画，采取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进行宣传，都收到了很好效果。

《救国三日刊》，是地下党舞阳县委直接掌握的一个有力的舆论工具，它对广泛开展抗日宣传，教育广大群众，起了很大作用。该刊是一九三八年二月创办的，开始由中共舞阳县委书记周泉森主持编辑，后由苗保泰负责。主要刊登县委负责同志撰写的指示性文章和各分会领导及骨干所写的抗日救亡宣传材料，兼载“青救会”及各分会、支会工作情况的报道，还发布一些前方战况通讯等文章。发行范围较广，每期销售量最多时达两千多份，除发至全县城乡各青救分会、支会外，还发往全省各县以及外省，影响很大。一九三八年六月，冯玉祥将军视察阵地时到舞阳，“青救会”领导人胡田希、张复生（现名张凌）、柴凯等热情迎接了他，并向他汇报了舞阳“青救会”开展抗日救亡活动的情况，受到了赞

扬和鼓励。六月二十一日上午，冯玉祥将军请“驻军营长以上长官及地方上的先生们吃抗战饭”，胡田希代表“青救会”应邀参加。会上，冯玉祥欣然挥笔，为《救国三日刊》题写了刊头。此举不但提高了“青救会”的政治地位，扩大了影响，而且办刊经费也随之得到了解决。同年十一月，县国民党当局强令“青救会”停止活动，出版百余期的《救国三日刊》，不久，即被迫停刊。

开办书店，发行进步书刊，也是“青救会”宣传共产党抗日政策和从事救亡运动的主要形式之一。一九三八年七月，中共舞阳县委以“青救会”名义派共产党员陈麟堂、宋运台在县城北大街开设了战时书报供应所，后又采用中国文化服务社舞阳分社、新生书店、合记书店等名称，销售进步书刊。书店和武汉、重庆、延安等地的新华书店取得联系，秘密发行《列宁选集》、《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社会科学概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教程》等著作。书店还公开发行《新华日报》，等报刊杂志，发行数额远远超过全县销售的国民党各种报纸杂志的总和。就在这个交通并不方便的舞阳县境内，凡属“青救会”势力所及的大小区、镇和学校，都能读到多种进步书报杂志。

一九三八年六、七月份，“青救会”在县城西大街路北民众教育馆后院开办读书班。县委派妇女部长李持英主持读书班事务，吸收县城进步青年和各区选派的党员、青救分会与支会骨干参加，学习马列著作、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及宣传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内容的文章。还教唱一些救亡歌

曲。青救会的领导分别在读书班讲授各门课程。有的地方还举办了青年夜校，如东南区、西南区、城关区以及东北区的胡岗、冻庄、玉皇庙等村，他们从识字教学入手，进行抗日救亡宣传。

积极开展募捐，是“青救会”活动经费的主要来源。“青救会”员带头捐款，并广泛宣传“国难当头，保家卫国，抗击日寇，人人有责；有钱出钱，有物出物”的道理，收到了明显效果，保证了开展各种抗日救亡活动的费用。“青救会”总干事臧自修把商会会长齐卓堂及富绅孙梦山、夏建章、孟胡子等请到家中，晓之以理，并敦促其父臧绍武带头解囊，使与会每人一次便捐了银元二十元到五十元。“青救会”宣传股长胡田希一度曾向社会名流、名商陈苇南、陈朗轩、胡灿宇、胡卓卿、王仿愚等募捐，也都达到了预期的目的。这些捐款除保证“青救会”的活动经费外，还购买慰问品赠送给抗日部队。

三

“青救会”和当时驻在舞阳境内的河南大学战时教育工作团、华北剧团相结合开展抗日宣传，也极大地教育了全县各阶层人民，使共产党的抗日救国政策深入人心，唤起了人民群众的高涨的抗战热情。同时，“青救会”的建立还为中国共产党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到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全县发展党员达三百余人，其中大部分是“青救会”会员。中共舞阳县委曾多次把在救亡运动中成长起来的积极分子送到延安和豫、皖、苏以及鄂豫边根据地，为抗日战争输送了骨干力量。政治形势恶化后，中共舞阳县委又把“青救会的骨干力量逐步转移到县抗敌自卫团政训处，并使他们控制了该

处的各种主要活动和部分武装力量，为抗日后期打开舞阳局面，建立根据地奠定了思想基础、组织基础和群众基础。

由于舞阳地下党组织的积极领导和广大青救会的努力工作，舞阳县青救会成为全省青年救亡团体中的典范，多次受到省委青年工作委员会（简称省青委）的表彰。为了推广舞阳青救会的经验，省青委于一九三八年六月在舞阳召开了全省（除沦陷区外）各县青年救亡团体代表会议。省青委书记谢帮治主持会议，吴祖贻、袁宝华、姚雪垠、丁秀、陈少景等参加了会议。舞阳青救会代表臧文德在大会上介绍了“青救会”开展工作的经验，受到与会代表的好评。会上成立了“河南省青年救亡协会”，通过了省青协会章，发表了宣言。九月，舞阳青救会常务执行委员柴克随省青委书记谢帮治、豫东交通员老张一起，赴延安参加了西北青年救国代表大会。大会奖给舞阳青救会一些马列主义书刊，柴克并在陕北公学介绍了舞阳青救会的工作经验。

209

抗日战争时期 舞阳县的《自卫日报》

王立平自述 范振江整理

提起办《自卫日报》的事，得从舞阳县抗日青年救国会（以下简称青救会）办的《救国三日刊》谈起。

“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日战争开始了。舞阳县旅外学生臧文德、陈麟堂、胡田希等回到家乡，于一九三七年十月成立了舞阳县青救会，会员发展到五千多人，在中共舞阳县委书记周泉森的领导下，于一九三八年二月，舞阳县青救会创办了《救国三日刊》，广泛开展抗日宣传工作。同年十一月，县国民党当局强令青救会停止活动。出版百余期的《救国三日刊》也被迫停刊了。

就在这时，舞阳县国民抗敌自卫团成立个政训处。民团司令刘馨吾的胞弟刘丹岑（青救会股长）任政训处主任。他官职虽小但野心很大，一心想要把政训处办成大衙门。于是，办报纸，成剧团，办政训班，积极拉人抓权。中共舞阳县县委斟酌情况，审时度势，决定利用各种关系，将青救会大批骨干和积极分子转入政训处，运用合法形式，进行爱国抗日救亡活动。通过拜把子、拉关系、请客等活动，刘丹岑聘用

我（因过去办过《救国三日刊》）去办报纸，李经伦（在青救会话剧团任过团长）去办《舞卫剧团》，董仲衡去管理事物。这样，我们三人就首先进入政训处开展工作。不久，青救会骨干又进去了几十人，从而参与了政训处的各种主要活动。

当时，县政府办个舞阳简报，三天油印一期，登十条八条新闻贴在街上。政训处成立后先将简报接过来，并试办成小型日报。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八日《自卫日报》正式创刊。报社社长由自卫团政训处主任刘丹岑兼任，工作人员有收音员、拟写员、发报员等。印刷由县救济院承包。编委委员有：胡田希、臧文德、苗宝泰、李再藻、胡赞虞（张平）、张复生（张凌）、效信趁、王立平。其中，除效信趁外（因系特殊关系党员，别人不知，故认为不是党员——县党史办注），其余均为共产党员，直接受中共舞阳县委领导。这就使《自卫日报》借简报之尸，还了《救国三日刊》之魂，名属国民党地方武装之报，实由共产党地下工作人员主办的抗日宣传刊物。

《自卫日报》是石印，日出两版（四开单面印）的地方小报。第一版报头下印着发行人和主笔“刘丹岑、王立平”。报头左右两小块登些警句或插图。报头下面两三栏，是中央社发布的国内、外新闻和简短扼要的本县消息。若有短评、社论、重大要闻，刊登在第一版的显著位置，或以黑线、方框标明，以引人瞩目。第二版大多是讨论性文章。刊登些抨击时弊的杂文、漫谈、争论、奇谈等带有硝烟味的文章。尤其受人欢迎的是“小茶馆”园地，三言两语，及时议事，一针见血，颇能给人以痛快之感。并特别注意利用第二版版面发

表讨论性文章，来宣传抗日活动。因为讨论要各抒己见，但各人立场、观点不同，争论是难免的。即是出现奇谈怪论也不足为奇，而正好可以用来进行合法的抗日宣传。记得一九三九年八、九月间，《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引起强烈反响。一天，社长刘丹岑交给编委一篇文章，并叮嘱予以刊载。我一看是开元中学语文教员刘达士写的关于评论《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文章，内容主要是谩骂苏联背信弃义，从而破坏中苏友谊。社长交办的文章不登当然不行，但登了影响中苏友谊，不利于抗日宣传。向县委请示后，编委要我出面写一篇同题异趣，持论公正的文章，用大半版篇幅刊登在第二版显著地位，把刘达士的文章登在第二版下角。这样既满足了社长的要求，又批驳了刘达士的文章，明褒暗贬，一举两得。

由于《自卫日报》是由共产党地下工作人员主办的《救国三日刊》的化身，加之孟玉华同志当时在竹沟新四军留守处工作，经常寄些《拂晓报》、《黎明报》给编委，不仅能够明确办报方针和斗争方向，而且极大地丰富了报纸内容，因而从版面到内容、题材等都较活跃，很受读者欢迎。除各区、乡为派销外，大部分为学校教师、学生、机关团体和邻县有关人员自费订阅。同时也和邻县的救亡小报、通讯等互相交换。出版不久，销售量即达一千多份，对扩大抗日宣传起到了一定推动作用。但时间不久，由于国民党地方当局的蛮横干涉，一九四〇年初《自卫日报》便被扼杀了。

少奇同志舞阳“小庄一宿”考

舞阳县博物馆

一九八〇年五月二十二日《解放军报》载有龙潜同志所写《随刘少奇同志赴华中敌后》一文。文章介绍了党中央于一九三九年九月，为了贯彻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确定的“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决定派刘少奇和徐海东等同志到华中加强领导的斗争片断。刘少奇等同志，从延安出发，自九月至十一月，穿行于日、伪、顽势力之间，日行夜宿，领导建立和巩固了华中抗日根据地。龙潜同志的文章共五部分，其中“小庄一宿”一段，记述了刘少奇同志带领同志们在舞阳住宿的经过。兹将“小庄一宿”摘录于下：

“从叶县向竹沟前进时，中间经过舞阳县，在县城附近的一个小村庄住了一宿。

“那天我们走了一百多里，到那里已经满天繁星了。这个庄小得很，好不容易才号到一栋漏风透气的破草房，里头还拴着一只猪。我们进去，吓得它嗷嗷直叫。征得老乡同意，从场院抱来麦秸，靠南墙根一溜撒开。大家累得够呛，把背包一铺开，多数人就和衣躺下，很快呼呼睡着了。

“少奇同志找老乡谈话还没回来。为了让他休息好，我们几个没睡的人决定再到村里去寻间条件稍好点的房子。没

走几步，恰巧碰上少奇同志回来。问明了缘由，他坚持不让我们再去找房。回到那间破草房，见离猪最近的地方还空着，就说：‘这儿不是很好吗？’说着拎过自己的背包，动手解起来。我说：‘你住这屋也行，但要换个位置！’少奇同志说：‘别争了，争也没用！’说话间，他已经和衣躺下。夜静悄悄的，只有那只该死的猪在不停的哼哼。少奇同志已经睡着了，我可睡不着，心里老是在翻腾：少奇同志这个人，乍一接触好象很严肃，不好接近。过不了多久你就会发现他是一个言少行多、表里如一、忠诚老实、平易近人的人。一路上，他白天和大家一样走，晚上和大家一起睡，吃一样的饭，睡一样的地铺。经过豫西国民党第二战区时，少奇同志扮作有公开身份的徐海东同志的秘书，尽管国民党的道道关卡盘查很严，也没有发现半点破绽。因为他们连做梦都想不到，一个身上沾着草叶，草鞋上沾着泥巴的人，会是我党中央代表、中原局书记！”

为了弄清刘少奇同志曾经住宿过的这个小村的所在，我们直接和龙潜同志去信联系，根据来信提出的线索，结合文物普查，在县城东北各小村召开老人座谈会。文物普查小组在九街乡胡岗村东，石岗和玉皇庙两村之间的小苗庄召开老人座谈会的时候，没有获得任何结果。又到未参加座谈的老人家里挨户访问，访问到苗国林家，他家老太太说：“那一黑间，有好几个兵就住在俺家。那一黑，我搂着孩子，睡的早，记得清早一老早，老头子起来送他们，天不老明就又回来了。老头子回来说：‘不知道是哪队伍，说话可和气啦！’……”

文物普查组把调查材料整理誊写一份，连同示意图给龙